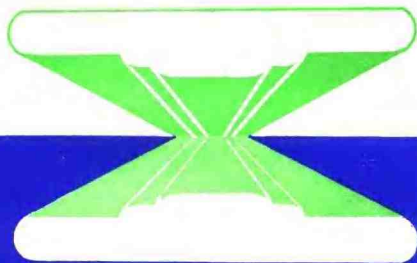


对外贸易与汇价决策新论

王国乡 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对外贸易与汇价决策新论

王国乡 著

王 著 1996.6.21.

王 著 1996.6.21.

中国金融出版社

(京)新登字142号

责任编辑:戴世洪

对外贸易与汇价决策新论

王国乡 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5.76印张 143千字

1992年2月第一版 1992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5049-0721-0/F·382 定价: 3.50元

序

《对外贸易与汇价决策新论》一书，以其立论的新颖、逻辑的严密、联系改革实践的深度与广度，而自成一家之言，展现于我国学术园地，读来令人耳目一新，颇受启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对外开放事业已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对外贸易与金融关系的发展正在突破旧经济体制的束缚，按照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原则改革传统的涉外经济体制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实行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本身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它既要求有科学的外贸与外汇理论作指导，又要求通过切实可行的决策将理论付诸实践。在这方面，我们既不能照搬资本主义的现成模式，又没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成功经验可资借鉴。因此，总结我国经济与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探索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外贸与外汇理论模式和决策方法，已是摆在广大涉外经济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项艰巨而又迫切的任务。王国乡同志的这本专著正是适应涉外经济体制改革需要的一部力作。该书从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立场出发，以外贸宏观经济效益极大化为目标，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构筑了以严密的数理分析为基础的外贸与外汇理论体系，并以此为依据全面论述了我国涉外经济体制配套改革决策的最优化原则。这对于促进我国涉外经济理论的发展，推动我国涉外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是大有裨益的。

该书提出了以边际比较利益概念为核心的外贸理论。这一理论汲取了李嘉图比较利益学说的合理内核，肯定不同商品的国内外价格比率的差异是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存在比较利益的标志，一

国只有出口价格比率较小的商品，进口价格比率较大的商品，才能把比较利益转化为外贸经济效益。但著者扬弃了李嘉图的平均数观念，而采用边际（增量）分析方法，论证了比较利益作为经济变量的特质，即任何两种商品之间存在的比较利益（作为价格比率的差额）都会随贸易量的增加而递减，从而任何国际贸易商品都存在一个贸易量的边际限度，超出这一边际限度扩大贸易量不仅不能产生外贸效益，反而会带来外贸亏损。在此基础上，该书还论证了在多种商品加入国际商品交换的条件下，外贸宏观经济效益极大化（比较利益充分实现）的数量条件和市场机制自动调节外贸宏观效益极大化的规律，以及在利用外资条件下长期比较利益实现的规律。著者运用这一研究结果解释了我国现阶段外贸经济秩序某些混乱的原因，也展示了理想的社会主义外贸经济秩序的最优化图景，从而为实现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该书还提出以边际购买力平价概念为核心的汇率决定理论。这一理论汲取了传统购买力平价论的合理内核，肯定汇率作为两国货币兑换的比率是由一定商品所体现的两国货币的购买力的对比决定的。但是著者扬弃了传统购买力平价论的平均数观念，而采用边际分析方法证明，汇率是由外汇收支平衡条件下边际进出口商品所体现的购买力平价（即边际购买力平价）决定的。据此说明汇率的功能在于划定进出口商品的边际界限，保证所有出口商品的价格比率都小于所有进口商品的价格比率，从而保证外贸宏观效益极大化条件的实现。著者强调指出，所谓边际进出口商品就是既不能进口盈利也不能出口盈利的商品，亦即非国际贸易商品，因此，边际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实质是肯定只有非国际贸易商品所体现的购买力平价才能决定汇率。这一结论同我国学术界流行的主张根据进出口商品平均换汇成本（平均购买力平价）决定汇率的理论截然不同，但著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失为理论上的创新。

研究外贸与外汇理论的目的在于应用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该书着重正是运用上述理论系统地论证了我国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的各项决策的最优原则。这包括对外贸易宏观经济目标与运行机制的选择，外贸企业经营目标、价格、汇率与税收决策的选择，国际收支管理决策的选择，以及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策略的选择。这些决策原则的选择，不仅有充分的理论根据，而且具有可操作性，因而对于实现我国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总之，我深信，王国乡同志这部专著的出版，定会引起我国学术界的瞩目。它的学术价值将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中得到验证。

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戴伦彰

1990年7月16日

前 言

本书为外贸、汇价理论学术研究著作，主要是从社会主义国家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益极大化的目标出发，采用边际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阐明了我国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对外贸易与汇价决策的最优化原则，以及按照这些原则进行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的策略选择。

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绪论部分着重分析我国实行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以后对外经济秩序的现状，指出我国涉外经济体制上的双轨制（包括外贸企业的创汇目标与效益目标并举的双轨制，官定汇率与调节汇率并存的双轨制，外贸企业按计划价格购销与按议价购销的双轨制）是造成我国现阶段外贸经济秩序某些混乱的根本原因，据此论证了加强我国对外贸易与汇价决策的理论研究和进一步深化我国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第二章根据比较利益原理，采用边际分析方法，阐明了实现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益极大化的必要条件是：（一）所有出口商品的国内外价格比率（本币价格/外币价格）都小于所有进口商品的价格比率；（二）进出口贸易额（外币额）基本平衡；（三）在上述两个条件下最大限度扩大进出口贸易额。第三章阐明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在外贸企业以最大利润为目标决定商品进出口方向和数量界限的情况下，通过均衡汇率（由外汇供求平衡条件决定的汇率）和均衡价格（由商品供求平衡条件决定的价格）的调节，将能保证自动实现外贸宏观经济效益极大化条件。第四章根据市场机制自动调节外贸宏观经济效益极大化的规律，指出我国涉外经济运行机制的最优选择是实行有计划的市场调节，并进而阐明在涉外

经济领域实行有计划的市场调节机制所应采取的政策措施和改革策略。第五章着重从基础理论方面阐明本书提出的外贸理论（作为一种边际比较利益学说）与汇价理论（作为一种边际购买力平价说）的科学意义。

本书的主要特点是，第一，把对外贸易决策与汇价决策的理论研究密切结合起来，并把是否有利于提高外贸宏观经济效益作为判断汇价决策及其它涉外经济决策是否合理的依据。第二，本书达到所有结论都是以严格的数理分析为依据的。为了使数理分析明确易懂，本书采用了图象分析方法。这些图象对于通晓西方经济学的读者来说是一目了然的；而对于不熟悉西方经济学的读者来说，只要在识别最初几条曲线时就注意弄清它同数表的关系，则也不难理解这些数理分析的意义。第三，本书提出的有计划的市场调节机制，作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一种理论模式，不仅对于实现涉外经济体制改革，而且对于实现涉内经济体制改革，也具有普遍的实践意义。它既不同于我国现行的以双轨制为特色的“板块结合”模式，也不同于我国理论界有些同志倡导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层次结合模式，而是一种把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起来的模式。笔者确信，实行有计划的市场调节模式是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受到厉以宁教授、甘培根教授、虞关海教授、戴伦彭教授和茅于軾研究员的热情指导与鼓励，在此特表示诚挚的谢意。

作者

1989年7月于中国金融学院

FOREWORD

The author expounds the principles of optimization for foreign trade and the policy to determine exchange rate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market economy with planning guidance. The approach employed is a combination of marginal analysis and normative analysis that aim at the maximization of the macroeconomic effectiveness in foreign trade for a socialist country. The author also explains the policy options as a result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bove mentioned principles.

The book consists of six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or the introduction, describ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which is the outcom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y system in foreign trade sector. The dual economy, including the dual purpose of foreign exchange earning and economic effectiveness for firms; the dual exchange rate, planned and adjustable; the dual transaction of foreign trade sector at planned price and at market price, has been the source of chaos in foreign trade sector. Thus, it is urgent to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in trade and in the exchange rate determination, and to deepen the reform in foreign trade sector. The second chapter lists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to maximize economic effectiveness in foreign trade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marginal analysis. These conditions are: 1) All the ratios between price in domestic market and the price in foreign countries for export goods (in terms

of domestic currency/foreign currency) must be smaller than the same ratios for import goods. 2) The trade is a balanced trade in general (in terms of foreign currency). 3) The trade should be expanded as far as the aforementioned conditions are satisfied. The author explains in the third chapter that the market economy can achieve maximum macroeconomic benefit automatically by means of profit orientation of firms who determine the commodities and quantity of their import and export provided the exchange rate and price of commodities are adjusted by supply and demand approaching an equilibrium condition. In the fourth chapter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 best policy in conducting foreign trade in China is a policy of market adjustment with a planning guidance which is a natural result of the maximum macroeconomic benefit achieved by automatic adjustment in terms of market mechanism. The policy and reform strategy along with these considerations are also elucidated. In the final chapter a theoretical conclusion is made that embodies a theory of foreign trade (a theory of margi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a theory of exchange rate (a theory of marginal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and the prevailing theories of foreign trade and exchange rate in China reviewed.

The book poses three distinguished particularities. The first is the combination of policy of foreign trade with the determination of exchange rate, and at the same time, a criteria is established that judges the policy of exchange rate in terms of maximization macroeconomic benefit. The second is the rigorous mathematical analysis in methodology which adopts mostly graphic presentation to ensure its easy understanding. Graphic presentation is familiar to those readers who know the contemporary economics, and is also not difficulty to the readers who do not know very well the con-

temporary economics as far as they can recognize the curves appeared in the first places. The third is the mode of market economy with planning guidance that is explained by the author in a unique significance in the theoretical aspect and in practice as well. Such a mode can be adopted not only in the foreign trade sector but also in the domestic economy. It is not the mode of planned economy bound with some market essentials or so called dual system, nor the mode suggested by some of the Chinese economists characterized by "state adjusts the market; market conducts firms", but a harmonic incorporation of planning with market.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market economy with a planning guidance is the only path which leads to successful economic reform for a socialist country.

Guo-Xiang Wang
at the China Institute of Finance
July 1989

第一章 绪 论

§ 1.问题的提出

一、我国外贸与汇价体制改革的现状与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事业的深入发展，我国对外贸易与汇价体制（或称涉外经济体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过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外贸体制已转入由地方政府和外贸企业多层次承包经营的轨道；单一的官定汇率制度已经被官定汇率与调剂市场汇率相结合的汇率制度所代替；从而为进一步发展我国的对外开放事业创造了相对良好的环境。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对外贸易基本上是由国家垄断经营的，地方政府和外贸企业没有经营的自主权，也不负盈亏的责任，进出口业务完全按照国家下达的指令性计划进行。与这种垄断经营的外贸体制相适应，在外汇管理上，我国实行的是一种高估人民币汇价的汇率制度，汇率的决定同外贸换汇成本或外汇供求关系脱节。在这种高度集中、垄断经营、政企不分、统负盈亏的产品经济体制下，外贸企业活力不大，经济效益观念较差，地方政府和外贸企业同吃国家（中央）的“大锅饭”，从而造成外贸宏观经济效益低下，国家财政负担沉重的局面。

自1979年以后，我国开始实行外贸体制改革，初步将外贸的国家垄断经营改变为多家分散经营，扩大了地方和外贸专业公司的进出口权限。为了调动地方和外贸公司出口的积极性，加强外贸企业的经济核算，弥补企业出口亏损，同时限制进口，稳定国

内物价，对人民币汇价管理体制也进行了改革，多次调低人民币汇价。这一改革对于松动国家垄断经营的外贸体制，扩大地方和外贸企业经营的自主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外贸企业自负盈亏的机制尚未建立，外贸企业的活力不足，外贸宏观经济效益低下的状况仍改善不大。因此，为了深化外贸体制改革，自1986年以来，国务院有关部门在总结以往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拟定外贸承包经营与建立留成外汇调剂市场相配套的外贸体制改革方案，经过两年的酝酿和试点，于1988年上半年开始推广实行。新的改革方案的内容是：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责任制，主要由地方政府向国家承包上缴外汇任务和经济效益指标，再由各地方政府进一步把出口创汇和盈利的主要责任落实到外贸企业和出口生产企业。在全面推行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基础上，外汇管理体制也作相应的改革，即在多次调低人民币官定汇率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外汇分配办法，根据地区差别和经营品种的差别确定不同的外汇留成比例。从1988年起，各地方、各部门、各国营和集体企业单位，以及外商投资企业的留成外汇，允许通过外汇管理部门设立的外汇调剂市场进行买卖调剂，调剂汇率由外汇调剂市场的外汇供求状况决定。其它上缴中央的外汇额度则按官定汇率结算。

上述改革方案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外贸与汇价体制正在摆脱旧的产品经济体制的束缚，开始向新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转轨。即在外贸经营管理体制上正在开始由体现产品经济的国家垄断经营体制向体现商品经济的外贸企业自主经营的体制转轨；在外贸经营目标上正在开始由体现产品经济的创汇目标向体现商品经济的效益目标转轨；在外贸财务管理体制上正在开始由体现产品经济的统负盈亏、吃“大锅饭”的体制向体现商品经济的外贸企业自负盈亏的体制转轨；在汇价管理体制上正在开始由体现产品经济的官定汇率向体现商品经济的市场汇率转轨。这几方面的转轨尽管只是“正在开始”，尚未完全转到真正商品经济体制的

轨道上去；但已显示出改革的巨大活力，对调动外贸企业经营的积极性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这不仅为我国发展对外开放事业创造了相对良好的环境，也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更加完善的外贸与汇价体制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实践的经验。

正因为我国的外贸与汇价体制正处在由产品经济向有计划商品转轨的过渡时期，产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尚未完全改变，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尚未完全确立，因而两种体制的磨擦在所难免，这就在改革实践中产生一些新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解决。

（一）外贸经营秩序有时混乱。其主要表现是：

1. 抬价收购、低价竞销的现象时有发生。据报载，近年来曾多次发生羊毛收购大战和蚕茧收购大战，多家外贸公司到羊毛和蚕茧产地竞相抬价收购，以致促使价格猛涨，严重扰乱了国内市场。与此同时，在多家经营同一种出口商品的情况下，各外贸企业为了抢客户，又低价竞销，因而削弱了我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造成肥水外流。

2. 有的商品进出口方向倒置。据报载，一些国内市场短缺的原材料，如牛皮、废钢、烧碱、石脑油、聚氯乙烯等，本来是应当进口或较少出口的商品，却被一些外贸企业，为了创汇的目的，大量收购予以出口，以致造成国内一些依靠这些原材料生产的企业停工待料，产量下降。

3. 有些外贸商品回流，同种商品的出口价格低于进口价格。据统计，1987年我国进口牛皮100万张，平均每张进口价格为43美元；同时出口牛皮200万张，平均每张出口价格为19.7美元。1988年进口牛皮115万张，平均每张进口价格为36.8美元；同时出口牛皮270万张，平均每张出口价格为23.8美元。如此一进一出，数千万美元化为乌有。更为严重的是我国外贸经营上的混乱为外商在原地搞出口返销创造了机会。据报载，1988年贵州一个单位从长沙国库以6800元一吨的价格买去200吨铝，以后几经转手，由广东一家公司出口卖给了港商。港商乘国内铝材短缺，又把这批

铝卖给了天津，开价为2400美元，按当时官方汇率1美元等于3.70元人民币计算，合人民币价格为8880元一吨；若按当时调剂汇率1美元等于7元人民币计算为16800元一吨。如此在境内境外几易其主，而实际上这批铝材还存放在长沙国库库，寸步未移。

（二）双轨制的矛盾突出

由于我国外贸与汇价体制正处于从产品经济体制向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转轨的过渡时期，产品经济体制的调节手段（包括创汇目标、高估的官定汇率、偏低的购销价格，以及指令性计划调节方法）尚未消除，商品经济体制的调节手段（包括利润目标、市场汇率、市场价格，以及指导性计划调节方法）尚未完全确立，这就形成了过渡时期特有的两种体制并存的双轨制，两种体制的磨擦就表现为双轨制的内在矛盾。

首先，在外贸承包经营中，外贸企业既承包创汇指标（含出口总额、出口收汇额和上缴中央外汇额度），又承包创利指标（补贴限额或上缴利润指标），这就形成了我国现行外贸体制中经营目标的双轨制。由于创汇目标与创利目标实现的条件是本质不同的，因而形成创汇与创利的突出矛盾。大家知道，外贸出口创汇的必要条件是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大于0，即不论国内外价格高低，换汇成本（本币价格/外币价格）大小，只要外币价格大于0，就能通过出口换取外汇收入。而外贸盈利的必要条件是出口商品的换汇成本小于汇率，进口商品的换汇成本大于汇率。这样，在双重经营目标支配下，就可能出现同一种商品按利润目标应当进口，而按创汇目标应当出口的矛盾现象。比如假定牛皮的国内市场价格为80元人民币（记作¥80），国外市场价格为20美元（记作\$20），则其换汇成本为¥400/\$100（¥80/\$20），若汇率为100美元等于370元人民币，即¥370/\$100，这时由于牛皮的换汇成本大于汇率，故从创利目标出发应为进口商品。但是同是这一种商品，在同样的价格和汇率条件下，从创汇目标出

发，却又是应当出口的商品，即每出口1张牛皮可收入外汇20美元，出口100万张便可创汇2000万美元。但在创汇的同时，每出口1张牛皮将亏损6元人民币，若出口100万张，便亏损600万元人民币（这里假定其它费用为0）。这种创汇目标与创利目标的矛盾，必然引起外贸企业经营行为的扭曲和外贸经营秩序的混乱。

其次，在汇价制度上，既保留高估的官定汇率，又存在反映外汇调剂市场供求状况的调剂汇率（近似于市场汇率），这就形成了汇率体制的双轨制。由于在以盈利为目标的经济核算中，汇率与换汇成本的比较是决定商品进出口方向的依据，即只有换汇成本小于汇率的商品才是出口有利的商品，也只有换汇成本大于汇率的商品才是进口有利的商品，因此，当某种商品的换汇成本（本币价格/外币价格）处在两种汇率之间的水平时，就会出现按官定汇率核算为进口有利，而按调剂汇率核算为出口有利的矛盾情况，从而造成同一种商品既进又出的混乱现象。举例说，当官定汇率为 $\text{¥}370/\text{\$}100$ ，调剂汇率为 $\text{¥}650/\text{\$}100$ 时，如果牛皮的换汇成本为 $\text{¥}400/\text{\$}100$ （国内价格为 $\text{¥}80$ ，国外价格为 $\text{\$}20$ ），则按官定汇率核算牛皮是进口有利的商品，而按调剂汇率核算牛皮是出口有利的商品。这样，当不同外贸企业收付的外汇按不同汇率结算时，就会造成进出口方向的混乱。

第三，在外贸价格管理上，既有偏低的计划价格（包括出口收购计划价格和进口内销计划价格），又有市场议定价格，这就形成了外贸价格体制上的双轨制。由于在国际市场价格一定而国内价格不同的情况下，会使同种商品按计划价格计算的换汇成本低于按市场议价计算的换汇成本，因而当某种汇率（官定汇率或调节汇率）处于同一种商品的两种换汇成本之间的水平时，就会出现按计划价格核算出口有利，而按市场议价核算进口有利的情况。举例说，假定官定汇率为 $\text{¥}370/\text{\$}100$ ，牛皮的国际市场价格为 $\text{\$}20$ ，国内计划价格为 $\text{¥}60$ ，市场议价为 $\text{¥}80$ ，则按计划价

格计算的换汇成本为 $\text{¥}300/\text{\$}100$ ，小于汇率，故为出口有利商品；而按市场议价计算的换汇成本为 $\text{¥}400/\text{\$}100$ ，大于汇率，故为进口有利的商品。这样当不同外贸企业按不同价格购销同一种商品时，就会引起进出口方向的混乱。

通过对各种双轨制内在矛盾的分析，可以说明外贸经济秩序混乱的体制方面的原因。因此，解决外贸经济秩序混乱问题，还必须从解决双轨制的矛盾入手。

（三）外贸宏观经济效益低下

在新的外贸体制改革方案实施以后，尽管由地方政府和外贸企业分层次承包了效益指标，但从执行的效果上看，外贸宏观经济效益仍处于低下水平，财政补贴外贸亏损的负担仍然沉重。究其原因这是由于地方政府不仅向中央承包了效益指标，还承包了创汇指标，加上效益指标是软指标（效益以人民币表示，可以用其它人民币收入弥补其不足），而创汇指标是硬指标（以外币表示，只有通过出口才能收入外汇，不能用人民币收入来弥补其不足），因此，地方政府为完成创汇任务，必然牺牲效益指标，用亏损出口的办法来完成创汇任务。这是造成外贸宏观经济效益低下的根本原因。此外，前文提到的抬价抢购，压价竞销，进出口方向倒置，外贸商品回流，以及外贸经营管理不善等，也是由此派生的外贸宏观效益低下的原因。应该说，对外贸易本来是大多数商品经济国家积累建设资金的重要渠道，不论是国家和企业都能从对外贸易中取得巨额利润。然而，在我国，对外贸易却成为流失资金的渠道，外贸部门成为我国的亏损大户，近年来的亏损额均以百亿计，成为我国财政赤字的重要来源，也是诱发国内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为了扭转外贸亏损的不正常局面，减轻财政负担，我们才有必要进行外贸体制改革。但在外贸体制改革方案实施之后，外贸宏观经济效益仍不理想。这正说明，我国现行的外贸体制还存在缺陷，大有改进和完善的必要。